

谭伯牛

作品

「修订增补版」

战天京

晚清军政
传信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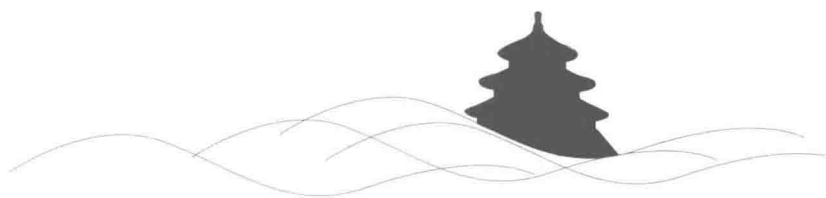
晚清军政名人的进阶之道
中国人情世故的至高哲学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谭伯牛

作品

战天京



晚清军政
传信录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天京 / 谭伯牛著. —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
2017.3

ISBN 978-7-5139-1431-4

I. ①战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军事史—史料—中国—
清后期 IV. ①E29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48025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

战天京

ZHAN TIANJING

出 版 人 许久文
著 者 谭伯牛
责任编辑 郭长岭
出 品 人 一 航
特约编辑 陈胜伟
封面设计 壹 诺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
邮 编 100142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28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1431-4
定 价 45.0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目录

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

三个湘乡人 / 003

团练之弊 / 005

新军 / 009

起隙 / 012

出长沙记 / 015

决裂 / 019

猪子出得湖 / 025

办与朕看 / 030

祺祥故事

文宗继位异闻 / 047

咱们旗人混蛋多 / 048

圆明园 / 051

清文宗不是汉武帝 / 056

“肃党”和“后党” / 059

太后垂帘的阴谋论 / 064

祺祥政变 / 078

战天京

势围和力围 / 087

二李战一曾 / 090

曾九呆子 / 092

奏折速成培训教材 / 099

李泰国舰队事件 / 107

替补队员李鸿章 / 121

李鸿章告别青涩岁月 / 125

苏州杀降 / 131

曾九的禁脔 / 145

战天京 / 166

白云可杀不可留

夺枪 / 175

病退 / 177

入京 / 183

绑架 / 192

附录：陈国瑞与谭廷襄书 / 196

相期无负平生（上）

忘八蛋，滚出去 / 201

“著名劣幕” / 203

有忍乃有济 / 207

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/ 209

出幕 / 212
迂琐的郭巡抚 / 218
纯刚与至柔 / 226
查办亲家 / 231
向亲家诉冤 / 235

相期无负平生（下）

挽联 / 243
左宗棠论夺情 / 245
伪幼主是死是活？ / 250
文人李元度 / 260
烈女怕缠夫 / 267
道旁苦李的蒂儿 / 270
相期无负平生 / 278

曾九暴富传说

天京的圣库 / 287
曾国荃在富豪榜上的排位 / 291
算术可以破谣 / 293
传说的背后 / 297

引用及参考书目 / 303
大事年表 / 310

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



咸丰四年末，收复武汉后，湘军水陆并下，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，随即进攻九江、湖口。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，被太平军封锁湖口，不得重返长江，水师遂被分割成外江、内湖两部分。外江水师多大船，不能近战；内湖水师多小艇，不利补给。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，又分兵攻击武汉、江西，准备活生生把湘军“枯”死在长江中段。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，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，每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。军事方面，名将塔齐布、罗泽南递相沦谢，后继无人，攻守俱惫。经济方面，江西省官方吝于给饷，晋、陕、川、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票，全靠湖南协饷和办捐收厘苦苦支撑。形格势禁，师久无功，朝廷不仅不予谅解，甚至以“顿兵不战，坐耗军需”^[1]严词诘责。

“每闻春风之怒号，则寸心欲碎；见贼帆之上驶，则绕屋彷徨”^[2]，这是曾国藩当日向皇上哭诉的哀辞。既是杜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，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。自湘军创办，迄于困守江西，差不多五年时间；这五年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五年。

1

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。

2

《统筹全局折》（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七日），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（一）。《曾国藩全集》下文简称为《曾集》。

三个湘乡人

咸丰二年八月，太平军围攻长沙，失败。年底，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、王鑫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，帮助防御。恰在此时，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，命令在乡办理团练，于是实行拿来主义：在兵源上，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；在练法上，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，开始筹建湘军。

根据罗尔纲的统计，湘军将领中，书生出身的占到58%的比例，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，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67%。湘军草创，分别率领中、左、右三营的罗泽南、王鑫和邹寿璋，就全由书生起家。较之腐朽溃烂的绿营，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，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，稍存知耻、爱民之心，可以切实做到“不怕死、不要钱”。而时人称为“罗山先生”的罗泽南，一生服膺宋儒，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，一拍即合，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整合。

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，根据曾国藩的总结，是“不忧门庭多故，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；不耻生事之艰，而耻无术以济天下”^[1]。罗泽南家里很穷，穷得每要吃饭，就去当铺。他的命很苦，苦得十年之内，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。但是，再穷再苦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

1

《罗忠节公神道碑铭》，《曾集·诗文》。



罗忠节公祠遗迹。罗泽南故居在湖南省双峰县石牛乡湾洲村三柱组，2010年10月，李志和先生领我去瞻仰，故居边上就是他的专祠，可惜皆已残败。照片为刘安定先生所摄。

志。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扛过来，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、下马讲学的风范，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。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“乱极时站得定，才是有用之学”（临终遗言）。至于一介书生，亲临行阵，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，他总结为：“无他，熟读《大学》‘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’数语，尽之矣。”^[1]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，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、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^[2]。塔齐布是湘军名将，咸丰四年七月，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作，与太平军展开遭遇战。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“儒将”的，但是这次合作改变了他的看法。当日，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，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。罗泽南从容调度，派五百人守营，五百人迎战。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，每路不过一百多人，但是主攻、旁击、抄尾，井井有条。就凭这种布置，竟然数战数捷，力保大桥不失。此后，塔、罗并称，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。

王鑫是曾国藩的老乡，又是罗泽南的弟子。他长相“清癯”，但是“声大而远”，语速极快。师徒们围坐讲学，

1

《清史稿·列传》卷一百九十四。按，此事最早的出处或在方宗诚《柏堂师友言行记》卷三：或问公（泽南）读何书，公曰，吾只玩味《大学》“知止而后有定”一节，无他兵法也。

2

《致严仙舫》（咸丰四年八月十五日）：“罗山，一老学究耳。与宗棠素尝论学，持论平实稳惬，作事有条理；可见者不过如此。及其将兵，胆略俱壮，随机立应，竟为宿将所不及。”见《左宗棠全集·书信》（一）。《左宗棠全集》下文简称为《左集》。

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，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叽里呱啦，滔滔不绝，别人根本插不上嘴。罗泽南不止一次地对他发脾气：“璞山（鑫字）盍少休，让吾侪一开口乎？”王鑫这才自笑鲁莽，把“话语霸权”交还给老师。他嗓门大，志向也大，十四岁就提笔刷墙，写下一段豪言：“置身万物之表，俯视一切，则理自明，气自壮，量自宏。”用大白话表示，就是崇尚力量，不为人下。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，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，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，乃至决裂。

一开始，曾国藩很欣赏王鑫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，称赞他“真可爱也”^[1]，引为臂膀。但是，王鑫不是“以利为义”、一味愚勇的武夫，而是有点哲学思想的人：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，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。以湖南为大后方，以湖北为后勤中心，支援江、皖，肃清东南，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鑫都能设想的远大前程。可是，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，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，更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、事权明晰。具体来说，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决定了曾、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，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。

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，开创了湘军。

团练之弊

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，也就是说，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哪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。圣旨所谓“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、搜查土匪诸事务”，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，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。“帮同”的意思，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，至于怎么协助、协

1

《批管带左营湘勇候选县丞王鑫禀》（咸丰三年七月）：“以极疲之卒，当极骁之贼，而能尽力苦战，大获全胜，真可爱也。”见《曾集·批牍》。

助到哪一步，就是天意高难问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，走哪儿算哪儿了。当然，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，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、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。导致这种模糊局面的形成，原因不在于咸丰，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——嘉庆皇帝。

嘉庆元年，川、鄂、陕、豫四省交界地区，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，此起彼伏，越闹越大。到了嘉庆四年，单凭国家正规部队——绿营兵的实力，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。恰在此危急时刻，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，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，重新包装，摇身一变成为团练题材，在朝野热炒之下，竟然连续涨停，托住大市，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，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，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。白莲教被团练制度干掉了，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，用来对付太平天国。所以，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，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，并刊刻嘉庆初年的《筑堡御贼疏》《坚壁清野议》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，颁发各省，号召大家边学边干，苦练快上。可是，实际效果如何呢？

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：清查保甲，坚壁清野。清查保甲，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，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，不用东堵西捂，手忙脚乱。坚壁，就是砌高垒，挖深濠，修缮城防；清野，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，清割农田作物，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，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。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，在没有统一指挥，各自为战，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，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“流贼”都不行。而一旦成为流贼，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，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，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。除了跑到荒山野岭做“山贼”，再没有别的出路。而一旦堕落成山贼，政府军喘息已定，必然要步步为营，大举围剿。当此时也，外有重围，内无定饷，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，军心摇动，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。这时候恐怕是求做“降贼”也不可得了。大致来说，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。

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，都是乱民暴民，都是黄巢、李自成，政治定性区别不大。而实际上，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：白莲

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，多点并发，互不联属；太平军自金田起事，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、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，进退有度，攻守有节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，流动作战，没有根据地；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，以江浙为根据地，横行长江，从容进退。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，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，是所谓“流贼”；太平军则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，与清朝分庭抗礼，俨然敌国，是所谓“窃号之贼”。团练能搞定白莲教，也能搞定太平军吗？

毫无疑问，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。只可惜，事实面前，人人平等。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，这是客观规律，皇帝说话也不管用。

对付太平军，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。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，沿江东下，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，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下长江以前，可以归其类为“流寇”，到南京后，就得算是“割据”了。下长江以前，太平军一直被追杀，虽然攻城略地，一路席卷，但总显得狼狈，不无屁股向后、平沙落雁的尴尬。一旦进入南京，改元建国，粮饷充足，士气旺盛，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隅，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。定都以后，洪秀全立即派李开芳、林凤祥率领北伐军，胡以晃率领西征军，北边打到静海，西边打到武汉，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。更重要的则是，太平天国由始至终，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，不但远高于绿营，也略高于湘军和淮军。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做统计，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：胡林翼在湖北做巡抚，慨叹湖北“莠民”每每“兵至为民，贼来从逆”^[1]。洪山民众里应外合，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，罗泽南因此战死；后来收复，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^[2]。曾国藩困守江西，对各属民众“从逆如归”甚为恼怒，乃至教导部下不妨“斩刈草菅，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”^[3]。太平军

¹ 《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》（咸丰六年十二月三日），《胡林翼集·奏疏》（一）。

² 胡林翼原话不可见，但是通过左宗棠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给他的回信可以知道，他曾经有屠城的念头：“崇、通、兴国、通山，天下之乱国，鄂省之贼子也。取而抗之，乃足快意。”终于还是被左宗棠劝阻。见《左集·书信》（一）。

³ 《与李元度》（咸丰六年四月二十六日），《曾集·书信》（一）。左宗棠也说：“江西士民以畏贼之故媚贼，且为贼效死以捍援师，居然别一天地矣。”《答王璞山》（咸丰六年），《左集·书信》（一）。甚至袁州被围攻，太平军拟弃城而去，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。见《致胡润之》（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七日），《左集·书信》（一）。

1
《与王璞山》（咸丰六年）中说镇守崇阳的曾天爵是“贼中之循吏”，镇守广济的宋关佑是“贼中之孝子”，“民心倾向之”。见《左集·书信》（一）。

2
罗惇齋《太平天国战记》：“开科取士，试者二万余人，状元王弼。”

3
刘成禺《世载堂杂忆·纪先师容纯父先生》。

4
清朝的正规军队，本分为八旗和绿营。八旗由旗人组成，绿营由汉人组成。咸丰以前，八旗兵约二十五万，绿营六十四万。入关以后，旗兵就开始腐化，逐渐丧失战斗力。康熙以后，国家统治几乎就全依靠绿营了。但是，嘉庆年间，没有团练帮助，绿营不能抵抗白莲教起义；鸦片战争时期，绿营建制军队还不如三元里的市民更能重创英军。这说明咸丰以前，绿营的生命力就差不多消亡殆尽了。而太平军广西起义不过万人，其中死党能战者不过三四千人。驻广西绿营额兵当时有两万三千多人，土兵一万四千人，随即从云、贵、湖、广等邻省陆续调来十几万绿营兵，竟然还不能将太平军封锁在广西境内，任其北上东下，声势暴长，酿成十几年的动荡局面。可见当日的正规部队实在聊胜于无。参看罗尔纲《绿营兵志》。

5
金和《秋穗吟馆诗抄·椒雨集》卷三。

中石达开、李秀成不但善战，而且能安抚民心，引为己用，众所周知；其下层将领中，也不乏曾天爵、宋关佑那样能行“仁义”的“君子”^[1]。太平天国在武昌、南京都举行过科举考试，开考之日，应者云集^[2]，其中就不乏刘鹏、王弼这样学高才大的读书人。围城官绅中，固然有满门自杀的忠臣孝子，也不乏进言上策的“贰臣”“劣绅”。曾国藩一直敬慕的桐城派古文大师梅曾亮、著有《艺舟双楫》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，就住在李世贤的侍王府，每日优游谈宴，此间乐，不思蜀矣。^[3]

当日的太平天国，礼乐俱张，民众拥戴，不让“辨妖”，实在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权，一旦分兵四出，“吊民伐罪”，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，绝不是区区团练可以抑制的。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，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——绿营的战斗力，已经堕落到聊胜于无、权当摆设的程度^[4]。从广西到江苏，从追缴到围攻，派遣防剿的钦差大臣，如赛尚阿、向荣、琦善所率部队，大多时候只是虚报战况，苟且偷安，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。诗人金和有一首《初五日记事》，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：

昨日黄昏忽传令，谓不汝诛贷汝命，今夜攻下东北城，城不可下无从生！三军拜谢呼刀去，又到前回酣睡处。空中乌乌狂风来，沉沉云阴轰轰雷，将谓士曰雨且至，士谓将曰此可避。回鞭十里夜复晴，急见将军天未明，将军已知夜色晦，此非汝罪汝其退。我闻在楚因天寒，龟手而战难乎难。近来烈日恶作夏，故兵之出必以夜。此后又非进兵时，月明如画贼易知。乃于片刻星云变，可以一战亦不战。吁嗟乎！将军作计必万全，非不灭贼皆由天。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，日月不出不风雨！^[5]

绿营将领讲究“天时”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，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想象了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、军械优良的另一支政府军——太平军，而看不见绿营的影子。太平军旁出攻掠，都有后勤保障，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，困守小城。内无长饷，外无救兵，和嘉庆年间相比，主客易位，攻守逆转，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，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割。所以，练团数年，没有一点成效，“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股、专守一城者”^[1]。

新军

谈到曾国藩，俗口流传，总说他起家团练，后来扩展为湘军，完成了平乱大业。其实，曾国藩压根儿就没办过一天团练。第一手棋，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局。

早在道光末咸丰初，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性思考。咸丰元年三月九日，他递上《议汰兵疏》，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的抨击。他说：“天下之大患，盖有二端，一曰国用不足，二曰兵伍不精”，自一八四〇年以来，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（首付六百万，余款四年付清）；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，亏失九百万；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（戊申年统计数据）；连年水旱灾害，造成歉收、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，中央财政岌岌可危，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。而民生凋敝至极，不可能再刮油水，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。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，而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兵不可用，不裁白不裁。绿营兵之腐败，其普遍现象为“无事则游手恣睢，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，见贼则望风奔溃，贼去则

¹ 《派宋梦兰办理皖南团练片》（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），《曾集·奏稿》（二）。

杀民以邀功”，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不借助团练之力；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，退不能守，节节溃退；广西额兵、土兵三万七千人，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，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众，就是兵不可用的具体事例。所以，曾国藩建议“汰兵五万，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”^[1]。

尽管认识到养兵无用，不如不养，可是作为京官的曾国藩并没有办法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，例如日后他所倡导并一手做成的练乡勇为劲旅，并以此代替绿营。所以，在没有一支切实可用的新军代替绿营之前，在“教匪”日益猖狂、“国军”屡战屡溃的情况下，刚上台的咸丰皇帝是不敢贸然裁兵的。因此，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。

咸丰二年六月，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。七月二十五日，行抵安徽太湖，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，旋即回乡办理丧事。十二月十三日，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。终于，他有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实现的理想。但是，如前所述，用团练对付太平军，是不切实际的空想。旧军队和团练都不奏效的情况下，就只剩下创立新军这一条道路了。所以，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，他就复奏^[2]，提出了建立一支新军队的思路。不过，由于圣旨明确规定他的责任在于帮办团练，那么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，他也不敢公然拒绝。因此，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，明办团练，暗练新军。明里，他这么说：

圣谕团练乡民一节，诚为此时急务。然团练之难，不难于操习武艺，而难于捐集费资。

财政困绌，不像嘉庆年间可以“官给练费”，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，做不了指望。所以由此造成帮办团练的拖沓，可以获得谅解。暗里，他就不求其名，但择其实，阐述了练新军的办法：

¹ 《议汰兵疏》（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），《曾集·奏稿》（一）。

² 《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》（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），《曾集·奏稿》（一）。

于省城立一大团，认真操练，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，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。……参访前明戚继光、近人傅鼎成法，但求其精，不责其多；但求有济，不求速效。

一般来说，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，省城、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，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，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牾的。戚继光练的是新军，傅鼎办的是民团，根本是两码事，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日后，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的理论，而再没有提过傅鼎一个字。皇帝或者不够精明，发现不了他的小把戏，或者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一样，没有细看，于是草草批示：“知道了。悉心办理，以资防剿。”八年以后，由于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，曾国藩才可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：

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，初次折内奏明自行练勇一千，是臣所办者乃官勇，非团丁也。^[1]

就这么瞒天过海地玩了一次文字游戏，“湘军”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，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，大干一番了。

“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”，指的就是罗泽南、王鑫的湘乡勇兵。在曾国藩的指导下，按照戚继光的成法，这一千多个人分为中、左、右三营，分别由罗泽南、王鑫和邹寿璋统带，号称“湘勇”。这就是“湘军”的昉始。不过，“湘勇”的“湘”和“湘军”的“湘”还是有些微妙的区别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前者的“湘”，实际是“湘乡”的意思，因为当时还有江忠源的“楚勇”（新宁）、塔齐布的“宝勇”（宝庆）、林源恩的“平勇”（平江）等名目；后者的“湘”，才代表“湖南”。

¹ 《派宋梦兰办理皖南团练片》（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），《曾集·奏稿》（二）。